

建议“GPS反腐”应该是种反讽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没有最雷，只有更雷，两会期间，每天都会有代表委员的雷人提案议案出现。最新的雷人建议是：以GPS防范公车私用腐败。针对政协委员的这个建议，广州市纪委监察局日前在答复中表示，由于考虑到费用问题，目前在所有公车上装GPS条件尚未成熟。而该政协委员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装一个GPS和后台维护费用并不多，关键是看有关部门有无这个决心。(1月20日《广州日报》)

看着广州纪委一本正经地回复政协委员，严肃地论证GPS反腐的不可行性，我感到非常可笑——他们还当真把这个带着嘲讽意味的雷人

建议当成了严肃的建议，而没有认真反思建议中对公车腐败监督不力所包含的反讽。

不知道这位政协委员是带着什么心态提这个建议的，但从成本和操作来看，这根本难以实施——所以，我更相信这是以行为艺术般的建议，对既有的公车监管表达一种批判，对监管者表达一种不满，对公车治理表现出某种绝望：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公车私用，为什么这么多制度都终结不了公车腐败，难道非要给每辆车装一个GPS，才能遏制住泛滥的公车私用吗？

公车私用治理了这么多年，不仅未能遏制腐败，反而愈演愈烈；为遏制这种腐败出台了无数个制度，发布了无数个禁令，进行了无数次

暗访，可丝毫未能驯服官员——这种现实中，人们绝望地想到了GPS这种先进的定位、防盗技术系统。一次次试错后，一次次绝望后，纳税人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对付公车私用了，实在不信任纪委监管，对既有制度都失去信心，绞尽脑汁、万般无奈、苦思不得解中只有想到了GPS，这种想象中最牛的、最可靠的监控手段。

不由想起另一则雷人的政协委员建议。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为促进权力道德法律化，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廖寿良在制定《从政道德法》的提案中建议“以控制体重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他建议以定期称体重的方法，来判断公务员有没有利用公款大吃

大喝。这个建议公布后引来了舆论的哄笑，纷纷质疑这个委员的议政能力。其实，我认为这个委员并非真想寄望以称体重防公款吃喝，而是故意以这种荒唐的建议来表达对公款吃喝治理的批判：公款大吃大喝愈演愈烈，已经把政协委员的参政智慧挤压到“病急乱投医”的程度，实在控制不了了，只能搬出控制体重这种笨拙、原始的方法了。

如果当地纪委和监管部门对此还有耻辱感的话，应该从这个建议中看到批判，看到民众的失望。如果一个社会，真到了必须用GPS对公车进行监控以防滥用的地步，那才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耻辱，是所有官员的耻辱。(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GPS反腐”是很务实的选择

第二落点

当前，我国公车私用现象日趋严重。有人估算，一辆公车每年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10万元。再加上“一人有(开)公车，全家有油喝”的不少官场“油耗子”的存在，一辆公车一年的“公耗”令人咋舌。

正如广州这位政协委员所言，在公车上装GPS并不贵，这从我国不少大中城市的出租车和公交大巴上已装上GPS便能证明。这次有政协委员首度介入此命题，建言公车上装GPS并得到纪检监察部门的快速回应，应该说是一次小小的破冰，希望有更多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意识到监管公车私用的严峻形势，积极建言献策，让这一行之有效的技术性监督尽快开始实践。

之所以我认可这种技术性防腐措施，是缘于这种办法已被不少国家所证实其廉价性与有效性。瑞典现在的公车也安装有

GPS，以防公车私用。芬兰为防公车私用，在上世纪90年代末特别设计了GPS监控系统。这套装置是在公务车上安装一个带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一个按钮刻着“公务”字样，另一按钮刻着“私事”。官员用车时，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代码发射器就可把该车特定代码发至中央监控台。若监控者发现有人“错按”，便会当即追究。税务人员定期调用这个中央监控资料，公车私用者将自缴私用费用并挨重罚。此举推行五年以来，无一公车私用。

所以公车私用无国别，没有监督的技术硬件存在，任何一辆公车都有“私奔”的天性。之所以我国一大群公车爱“私奔”，是因为对公车的技术性监督偏软。公车管理，实则是一场权力与利益的长期较量，如果监管防腐的系统性制度设置尚需时日，我们完全可以让技术性监督防腐先行一步，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周明华)

“GPS监督”倒逼更大反腐决心

第三只眼

拜网络发展和普及之功，网络舆论越来越成为反腐的一块阵地。不仅是网络为监督腐败提供了便利，消费支付电子技术的发展亦是如此。公务消费如果全走银行电子支付系统，那些造假的公务消费就会无处遁形。这不仅仅是一些发达国家防止公务消费腐败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一些地方推出“公务消费卡”的理由。而广州政协委员建议给公务用车安装GPS，也同样和技术反腐的又一个手段。

得益于技术发展，为技术反腐提供了可能。但问题是，技术再发达，再进步，其对反腐的意义和作用也仅仅是工具性的。就像菜刀是否用来切菜，决定权在人不在刀。同样，技术能否

在反腐败中利用，在反腐者不在技术本身。比如，官员财产公布制度，目前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做到，但决策者的“缓慢”令人诧异；再比如，防止公务消费滥用的公务卡，也完全可以起到效果，但总有各种借口而使之变形走样。

技术反腐的困难，不仅是要不要把技术用到反腐上，还有面对技术的发展，有些决策者会有意无意地通过种种手段限制技术，迫使其远离反腐。比如，禁止“人肉搜索”，就等于给“人肉搜索”的反腐价值判了死刑。技术为反腐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但如果没有反腐的决心，得到技术优势的反腐大业，仍可能原地踏步。“GPS监督”或许不现实，但却是对更大反腐决心的一种倒逼。(王攀)

“在所难免”的猝死和不愿增设的医生

今日视点

“全国铁路春运每天发送旅客500多万人次，如果有一名旅客突发疾病猝死，在所难免”，这句话出自昆明铁路局局长运处副处长李淑云之口，听了让人心里直发寒。

1月20日的《春城晚报》报道，针对一名旅客猝死在昆明一重庆K160次列车上一事，昆明铁路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事件的调查结果，我将其总结如下：猝死的旅客陈善武患有心脏病，列车员接到死者妻子李正英的求助后马上报告了列车长，列车长和乘务员在5分钟之内赶到现场，通过列车广播寻找医生，并迅速联系120急救。当然，最后是“春运个别旅客猝死在所难免”，因此，死者之妻李正英向列车长屠建华表示了感谢。在问到火车上能否增设医务人员时，李淑云则称：没有规定要求火车配备医务人员，火车上只有个别列车员经过简单急救培训。

之前的报道中，李正英曾质疑铁路工作人员不作为致其丈夫身亡，并索赔20万，但到了昆明铁路局局长，陈善武的猝死却跟铁路部门毫无关系，并且铁路部门的应急举措还让死者家属“很感激”。我不敢说完全不相信昆明铁路局的调查结果，我也不敢说陈善武的死就一定跟昆明铁路局有关系，但我总觉得：这么大的事，昆明铁路局自己判自己没犯规，总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至于“春运个别旅客猝死在所难免”这句话，就更是让人心里发寒了——至少，事发列

车上如果有医务人员，就能马上对陈善武进行急救，如此一来，陈善武或许就不会死了。说出“春运个别旅客猝死在所难免”这样的话，说轻了是反省意识不强，说重了就是太冷漠——如果昆明铁路局局长懂得反省，他们就不应该拒绝人们对列车上增设医务人员呼吁，如果昆明铁路局不是太冷漠，他们就不会在死者尸骨未寒的情况下，为了急于撇清自己的责任，就冒出“春运个别旅客猝死在所难免”这样的话。

没错，现在是没有规定要求火车上要配备医务人员。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尤其是春运期间，列车上人满为患，过于拥挤的乘车环境，对许多有病史的乘客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诱因。平时不挤的话，他们或许能旅途平安，现在这么挤，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很可能发病。乘车环境变了，相关的应急措施也要跟着变，这实在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如果铁路部门有这样的常识，春运期间就应该在列车上临时增设医务人员，以确保旅客不会因为拥挤的乘车环境发生危险。现在已经有一位乘客死在了回乡的列车上，不管铁路部门是不是有直接责任，但由此进行反思总是可以的吧——如果这趟列车上临时增设了医务人员，是不是就可以赢得抢救时间？如果预防工作没做到位，如果没把可能的风险都考虑到，那么就请不要提什么“猝死在所难免”，因为正如铁道部副部长在刷票事件后道歉时所说，这会“伤害旅客的感情”。(本报评论员 赵勇)

重申办公室标准等于政策示弱

【中国观察之樵梓专栏】

国家发改委19日公布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规定正部长级别的官员办公室使用面积不能超过54平方米，县长书记不能超过20平方米。(《新京报》1月20日)发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是好事，但由于该《标准》没有提出具体实施细则和处罚措施，因此很像一次政策的翻版或重申。它的发布，不但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更像是一种政策示弱。

不要以为这项政策有什么新意，1999年，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计委，就已经发布了这一政策标准。当年12月21日，国家计委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机关办公用房建设等级与面积指标，所列标准与数据，与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标准”几乎完全一致。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计委最初发布的该项政策取得实质效果了吗？

简单回顾一下过往的新闻事件便知，在这期间，安徽阜阳市颍泉区、河南郑州惠济区等地政府将机关办公楼建成了“白宫”；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某街道

办建成高达10层的办公楼，却只有99名工作人员，人均办公面积170平方米，远超正部长级；连重庆黄金镇政府这样一些贫困的乡镇，也建起了“天安门”式机关办公楼……而在这期间，因超标建设办公楼这一直接原因而受到追究的官员，几乎没有。政府办公楼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的事实，早已将《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羞辱得体无完肤。而究其原因，无疑是国家标准只讲标准，不讲惩罚所致。这个道理就好比刑法规定杀人有罪，但不规定杀人将被判刑一样简单。

不重树政策的刚性，显然只会削弱政策的权威。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威信的政策根本无法抑制各地楼堂馆所的攀比之风，那么此时，发改委要做的不该是老调重弹，而是应当检讨政策的缺陷，经充分完善与健全后，再行公布。坚持让一项既有的政策依然以旧面貌示人，也许是要表明一种姿态。但这样做不但无法满足公众对严厉惩处腐败的期盼，反而会让人感受出中央政策在地方官面前的无力感。这么说来，国家发改委的这项“新政”还不如不发布。(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大办公楼与大办公室孰皮孰毛？

相关评论

且不说将来要新建的办公室，单说正在使用的，有多少县长书记的办公室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除非把与办公室连在一起的休息室以及会客区域一律除开，只把放办公桌的地方算办公室面积。假使这个标准真被严格执行，起到的只能有一个效果，那就是促使地方政府大兴土木，对官员办公室进行改建，把休息室与办公室隔开，把会客室与办公室隔开，甚至也给独立卫生间另开一个门。可是，这除了增加本不必要的财政浪费之外，哪能彰显一丁点的“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精神？

按照这个办公室面积标准，一个县政府所有班子以及各类分支机构，建一幢办公楼大概就绰绰

有余了吧？可事实上，财政稍微富裕点的地方，谁不是一个部门一幢办公楼，乃至一个独立大院？那么大一幢办公楼，即使一人一个办公室可能也是用不完的，于是大多拿来向社会出租，或者内部经营做生意，至于出租或经营所得，大概全部充入了内部经费，反正对纳税人而言全是一本糊涂账。

如今，大办公楼犹在，而且正在日日递增，新办公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生长。官员办公室面积是该规范，但前提是得先把办公楼规范了：一个县政府究竟需要多少、多大的办公楼？有没有必要一个二三十人的部门也单建一个机关大院？我在想，以这份官员办公室使用面积标准来匡算一级政府部门需要多少办公楼，一定是件很有意思也很惊人的人事。(盛翔)

“汪洋式网络观”亮在何处？

公民发言

19日，汪洋向广大网民拜年，其中的亮点在于其提及的不排斥“愣愣青”，也不贬抑“打酱油”。力主“顶”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1月19日《南方网》)

今天的网络社会，已不再是信息集散地那么简单，而是日益成为一个网络意见场。在这个场域里，众多的民间意见领袖诞生，而普通的民众，不

论学识、职位、地位、财富，只要你有鼠标和键盘，你就可以向大家传达你的所见所思。

现实中，真正的公民社会还远没诞生，真正关注公共利益的公民行动还乏善可陈。而在网络世界，公民社会已见雏形，众多钟砒时弊、惩恶扬善的公民行动在网上自发兴起，远者如汶川大地震时的网络救助，近者如“公款出国游事件”的揭露等等。

汪洋式网络观的出现背

景在于，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阶段，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既是政府的极大压力，也是政府重新自我塑造的重要动力。借助于网络，也是借助于民众，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政府、网络、公众三者之间的互信、互动、互相监督。政府自身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才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治理能力也会有很大提升。而只有政府尊重网络、善于利用网络的力量，并把网络当做建设公民社会

的重要力量、了解民意的一个阵地、政府与民众进行对话的意见交换场时，政府所期望的网络社会的理性、责任、建设性的一面才会显现。

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还需要把公民社会由网络请到现实中来，在现实社会中去拓宽公民参与公共事件的渠道。另一方面，则是建立“网络社会公约”，掀起一场针对自身的网络公民行动。(王海越)

央行该继续降息和放松市场信贷

【财经纵横之叶檀专栏】

央行受到很大的压力，许多人认为，央行2008年上半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应该对去年三季度开始的经济下行负责。以至于坊间传出央行行长一年白了头的传闻，这当然是戏言，但反映出央行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

央行从来就不认为过低的利率是好事。直到去年末，央行官员还在强调要防止紧缩之后的恶性通胀，这被讥讽为“半夜鸡叫”。事实上，从去年9月开始，虽然很犹豫，但外界的压力和节节下滑的经济数据，已经迫使央行加入国际降息大合唱，连续五次降息。

不过，央行是不情愿的。央行行长周小川1月12日在出席国际清算银行会议期间称，中国经济减速至今一直是适

度的，此处关键在“适度”，可见央行并不承认中国经济形势目前非常严峻，这也意味着央行不可能推出毫无保留的宽松货币政策。到去年11月一直在强调中国利率政策合适的央行副行长易纲，日前在《财经》杂志上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较大实施空间，“我们处在一个能攻能守的位置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1月7日表示，贷款利率不会大幅下调，在当前基准利率下，中国银行业的贷款利率相对来说是较低的。樊纲的话显示某些官员并不认为有必要继续大幅降息。

央行应该尽到本分，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在经济增长、就业与抑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目前经济增长并不乐观，温家宝总理强调2009年是艰难的一年。随着2008年12月份经济

数据陆续出炉，用电量的回升等给一些智囊带来了舒适的感觉。但库存减少、用电量回升与贷款激增，与其说是市场回暖，不如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工业品价格指数负增长，就足以说明工业增加值不容乐观。

而就就业形势如泰山压顶，如果算上失业的农民工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仅这一块硬性增长就在1000多万人，更别提每年增长的刚性就业人数。如果央行认可市场数据，就业主要靠民企解决，那么，他们应该想方设法给民企提供市场化的融资渠道，而不是在强调经济形势尚可、宽松货币政策不必过度的同时，忽视民企融资一筹莫展、小额信贷试点项目受到严厉约束而步履缓慢，根本无法解决民企融资难的问题。相比降息而言，民营

企业希望得到的是公平待遇。据笔者了解，浙江等地的不少民营企业继续借入高利贷饮鸩止渴，央行前期释放的资金被银行以“银政通”的方式，主要贷给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大项目。至于通胀，所有人都担心，不过，如果大家都失业，就别提什么通胀了。

可以肯定，为了刺激经济，在降息之前，购房、购车等大宗消费抵扣税等刺激举措可能陆续出台，财税政策将继续放松。如果仍不能阻止经济下滑，央行将不得不大幅降息。

要在目前经济结构下刺激通胀，央行必须降息，要调整经济结构，央行必须放松市场信贷，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央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不能重走2008年年中只看数据不看企业痛苦的老路。(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